

阳明学研究丛书

阳明学 扨论

王晓昕 著

儒家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其毕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孔子孟子，乃至圣亚圣，
立言甚高至于万世楷模，立言甚精至于千古流传……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

阳明学研究丛书

本丛书由贵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阳明学摭论

王晓昕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阳明学摭论 / 王晓昕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3

(阳明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43-0234-4

I. 阳… II. 王… III. 王守仁 (1472~1528) — 哲学思想—研究 IV. 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0155 号

阳明学摭论

王晓昕 著

责任编辑	郭发仔
特邀编辑	侯莲梅
封面设计	翼虎书装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87600533
邮 编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0 mm×203 mm
印 张	5.937 5
字 数	15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0234-4
定 价	1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总 序

作为一位伟大哲人、大思想家，王阳明的一生既辉煌灿烂又历经坎坷，既声名卓绝又频遭谤议；他执著教席又以知兵名世，是一代儒师而又戎马倥偬。其“文治而后可以武功”，其“内圣而后得以外王”，把自主原创之“知行合一”的圣门宗旨贯彻落实到了极致。

学术界对王阳明一生经历之划分，有“二段论”、“三段论”、“四段论”诸说。阳明生于公元1472年，卒于1529年，仅存世57年，不可谓寿；但流恩泽被后世，不可谓不厚。1508年，阳明于贵州龙场大悟心学之旨，在把几千年中国思想之进程来了一大扭转的同时，将其一生之求索作了两分。此所谓“二段论”。日本之阳明后学尤重“龙场悟道”一段，更把龙场冠以“王学圣地”而景仰之；后进而在“二段论”之基础上，将“贵阳三年”从中抽取出来，作一独立之段落。贵州诸学者，无论是前贤还是时人，均把此三载细以咀嚼，复多考论，引以为豪，于是有所谓“三段论”。持“四段论”之观点者，有见于古今史家之著，其论甚丰，恕不赘言。

以此观之，所谓四阶段，皆以帝号名明：一曰成化，二曰弘治，三曰正德，四曰嘉靖。

从成化八年（公元1472）到成化二十四年（公元1487），阳明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在经历了许多苦难而有趣的童事之后，他立下了“学圣贤”乃人生“第一等事”的志向。

从弘治元年（公元1488）到弘治十七年（公元1505），是阳明的青年时期。在这期间，他一直在苦苦寻求成圣立德的方法与途径，但始终不得要领。他的心灵处于一种漂泊不定的状态，“依违往复，无所归依”。他的心灵时而表现得过于浮躁，时而又转变

为极端的郁闷。他遇到娄一斋后，转辞章之习为朱子格致之学。他的确努力了，但因“格竹”失败，加上二度落第的挫折，他又动荡不安起来。这似乎是在到处寻找灵丹妙药，实为病急乱投医。这一时期，阳明的心灵的确处于浮躁与郁闷的交错状态。

正德初年，阳明开始步入他人生的最低谷。正德元年（公元1506）至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中年阳明度过了他最为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这也是他步入“不惑”和“知天命”的历程。在龙场（公元1508年），他克服了浮躁和郁闷，一下子找到了实现自己心灵和谐的根本办法。而且，他认为只有这种方法才是成圣立德的唯一途径。接下来，他决心要把这一实现个体心灵和谐的方法加以推广，推广到诸生，推广到群体，推广到社会，推广到国家，推广到天下。“知行合一”就是他最先寻找到的推广之法。于是，他开始在贵阳书院（公元1509）“始论知行合一”，这是他“知行合一”理论发展的最初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行合一”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修养功夫。他在离开贵州前往江西路过湖南时，曾悔惜在贵阳时对“知行合一”悟之待深、讲之待透。后来，他在与徐爱等诸生讲论“知行合一”时，开始把本体与功夫对接起来，“知行合一”渐渐有了本体的意味。从本体上的“良知”发出的“知”，当然是包含了“行”的；从本体上的“良知”发出的“行”，当然是蕴涵了“知”的。这是讨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论本身的展开路径。

只是到了晚年，即嘉靖元年（公元1522）以后，“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通道、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传习录》中之《钱德洪序》）。这时候，王阳明“知行合一”论已进入成熟之境界，正如其在《答顾东桥书》信中所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话作一当代的阐释便是：认识真切地付诸行动就是实践，实践的同时又明白、精确地体察

就是认识。认识和实践两者的功夫断不可分割。真正的认识是能够付诸实践的，不能实践就不能叫做认识。“知行”是可以统一在作为本体的“致良知”之上的。“知行合一”是一元的，而“知行”统一在“良知”之下也是一元的，这是阳明学说与主张二元论的程朱学说的不同之处。阳明晚年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浙江，他对学生解答完所谓“王门四句教”后，就最后一次步入了他征战的“不归之路”。

本套丛书共有五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阳明先生的思想学说、事功和诗文进行了探讨和评价。其中，不乏联系现时代而抒一己之见者，倘有贻笑之处，还望大方之家见谅并予以赐教。总之，在王阳明“龙场悟道”五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发现并发掘出了他的丰富思想体系中极富当代价值的精神内核。把它加以积极地培育、施行、光大，其意义无疑是深刻而久远的。

王晓昕

2008年春于贵阳龙洞堡



目 录

第一章 阳明“为学之变”	1
一、回顾“三变”说	1
二、龙场以前已有“四变”	4
三、析甘泉“五溺”说	9
四、“五变”说	12
第二章 阳明“为教之变”	14
一、静坐：是功夫还是本体？	15
二、龙场悟道：是功夫还是本体？	18
三、本体与功夫：一个融突和合的结构	20
四、是功夫之变，还是本体之变？	22
第三章 阳明之“立言”	25
一、“立言”于修德讲学	25
二、隆庆本《王文成公全书》	27
三、崇祯本《阳明先生集要》	28
四、两版本之异见略语	31
五、清光绪己卯《阳明集要三编（黔南重刊本）》	33
第四章 “致良知”与“物自体”	
—— 阳明与康德的哲学比较	37
一、“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感性的源泉	37
二、“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认识的界限	39
三、“良知只是心之本体”——理性的理念	41
四、“良知只是一个天理”——通向伦理学	43

第五章 阳明学研究的多维度思考	47
一、方法、视野与论域	47
二、知识与价值、“价值中立”与“非价值中立”	48
三、阳明学研究的多角度展开	50
四、从比较文化视野看阳明学	52
第六章 阳明“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和谐与“和而不同”	56
一、和合思想的理论前导	56
二、先秦诸家的和谐思想	58
三、人与自然的冲突	61
四、人与自身心灵、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冲突	65
五、“和而不同”的价值	69
六、“和谐”与“和而不同”的价值	70
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	72
第七章 儒学与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75
一、儒学曾经受到的两种待遇	75
二、儒的起源	76
三、儒学的新生	77
四、儒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80
五、儒学与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82
第八章 良知与世界关系的确立 ——良知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84
一、“良知”与和谐社会	84
二、和谐社会构建的合法性	87
三、和谐社会的合理化建构	90
四、生态文明城市是和谐社会的具体形态	93



第九章 “良知”与民生的对话

——简论儒家的民生观	96
一、儒家民生观的基本内涵	96
二、儒家民生观的历史价值	97
三、儒家民生观的当代价值	99
四、朱熹的民生思想	101

第十章 “良知”对生命的关怀

——哲学与发展	108
一、哲学的发展理念	109
二、哲学与发展的关系	112
三、哲学与人的发展	115

第十一章 在阳明心学中寻找资源

——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	117
一、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117
二、罗尔斯的《正义论》	120
三、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122

第十二章 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当代价值

——论作为贵阳精神的“知行合一，协力争先”	124
一、“知行合一，协力争先”作为贵阳精神的根据	125
二、知行关系的历史考察 与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理论建构	128
三、“知行合一，协力争先”作为贵阳精神的重要意义	145

附录一 阳明先生年谱	153
------------------	-----

附录二 喜谈《阳明先生集要》	171
----------------------	-----

参考文献	177
------------	-----



第一章 阳明“为学之变”

关于王阳明一生的学术经历，有“为学之变”与“为教之变”的说法，其中“龙场悟道”为两者之间的分界线。而“龙场悟道”之前的求索，又素有“为学三变”之论，且为学界所普遍认同。其中最具权威性的是黄宗羲《明儒学案》的“三变”之论，仔细分析下来，则应视为“四变”之说；而反映在《王阳明全集》中《年谱》的记录，似乎又有“五变”之事实。另外，“五溺”的说法也见于湛甘泉^①为阳明所刻之墓铭。于是，阳明的为学历程到底是“三变”“四变”“五变”还是“五溺”，如今成为大可一论的话题。

一、回顾“三变”说

▲ 黄宗羲的“三变”说

黄宗羲于《明儒学案》之卷十《姚江学案》中所讲关于阳明为学“三变”的一段话，最为引人注目。梨洲先生曰^②：

先生之说，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

① 湛若水（1466—1560），明哲学家，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今属广东）人。官至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少师事陈献章，后与阳明同时讲学，各立门户。阳明主“致良知”，甘泉主“随处体认天理”。认为“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心性图说》）；“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答杨少默》）。著作有《湛甘泉集》。

② 黄宗羲：《姚江学案》，见《明儒学案》卷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1页。

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梨洲的“三变”之说描述了青年阳明为学的四个时段，即一泛滥于辞章；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三出入于佛老；四居夷处困，即在龙场。四个时段构成了三次变化。第三次变化即“龙场悟道”，至此其学问“始得其门”。

▲ 钱德洪的《刻文录叙说》

除了黄梨洲的上述说法，还可从阳明的两位弟子钱德洪和王畿那里分别找到措辞类似但看法迥异的表达。先看钱德洪在《刻文录叙说》中所言^①：

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

钱德洪的这一说法与黄梨洲的说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龙场悟道”为界限。然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前者显然少了一个“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的阶段。既然只有三个时段，德洪所言岂不成了“二变”之论？

▲ 王畿的“三变”论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阳明的另一弟子王畿在《滁阳会语》中的说法^②：

先师之学，凡三变而始入于悟，再变，而所得始化而纯。其少稟英毅凌迈，超侠不羁。尝泛滥于辞章，驰骋于孙吴，其志在经世，亦才有所纵也。及为晦翁格物穷理之学，几至于殒。时苦其烦且难，

① 钱德洪：《刻文录叙说》，见《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4页。

② 王畿：《滁阳会语》，见《王龙溪全集》卷二，影印道光二年刻本，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0年版。



自叹以为若于圣学无缘，乃始究心于老佛之学……及至居夷处困，动忍之余，恍然神悟。

显然，王畿的这一说法是真正的“三变”说：一变是由泛滥于辞章而为晦翁格物穷理之学；二变是由为晦翁格物穷理之学而究心于佛老之学；三变则由究心于佛老至居夷处困后而恍然神悟。此“三变”说与黄梨洲同。至此我们可以认为，钱德洪所论，不如王畿与黄梨洲的看法准确。而今人凡举“三变”之说，通列梨洲、德洪、龙溪而不加区别，更有以德洪为引征者，殊不知龙溪之说才是原创。

不管怎样，“三变论”还是流传开来了。

中国台湾学者蔡仁厚在其《王阳明哲学》一书中有前三变为异质之变，后三变为同质之变的提法^①。任文利在其《心学的形上学问题探本》一书中引用梨洲、德洪、王畿“前三变”“后三变”的说法，认为黄宗羲所述阳明思想的演变，乃本于德洪与王畿之说。“其中，两个‘三变’的说法采自钱德洪，但不取其‘学’‘教’之变的区分方法。两个‘三变’的具体内容采自王畿，不过，王畿主‘再变’，并不以‘居越以后’为一变，黄宗羲则以‘居越以后’为一变。”^②除此之外，其他任何说法并不否认前、后“三变”的说法。陈来先生认为：“德洪前后‘三变’之说易于记诵，故明末以来，影响较大。”^③陈于书中亦对“三变”之说提出了质疑。他在书中提到：“事实上，甘泉所谓‘五溺’而一变至道与德洪‘三变’而至道所着眼点略异，甘泉的丙寅至道说是对泛滥异学而言的，而德洪的‘龙场悟道说’则是对宋学而言的。钱德洪与王龙溪二人都把龙场之悟作为阳明入关的关键，却都不曾提及阳明见甘泉及此前后阳明归于正学这一点。为什么他们把‘同质’之变看得重于‘异质’之变？就归本儒学而

① 蔡仁厚：《王阳明哲学》，三民书局1971年版。

② 任文利：《心学的形上学问题探本》，中洲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2页。

③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页。

言，至少在丙寅（公元 1506 年）已经完成了这一转变。然而，从整个阳明思想的历程来看，这个转变还不是最值得注意的。严格地说，他自己的思想尚未确立，他的全部困惑也并未最终解决，其中主要的障碍还是宋儒的‘格物’问题，这一问题自青年时代以来一直困扰着他。”^①陈来的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其意义至少有如下两点：一是会甘泉于丙寅至道算不算阳明为学历程的重要一变？这个问题历来被忽略了；二是视丙寅至道为“异质”之变，“龙场悟道”为同，是从儒、道、释三教之大别而言，诚然无咎；但从阳明自身的学术进路而言，他心学体系的正式建构，龙场之悟则是此前任何一变所不能与之并论的。本文于是循着这一思路，换一个视角，继续讨论阳明的为学历程。

二、龙场以前已有“四变”

除了“三变”，还有没有另外的提法呢？

《王阳明全集》中《年谱》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下面一段是《年谱》中关于阳明十八岁时的记述^②：

二年己酉（孝宗弘治，公元 1489 年。括弧内为引者注。下同。），先生十八岁，寓江西。

是年先生始慕圣学。先生以诸夫人归，舟至广信，谒娄一斋谅，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之。

▲ 第一变，由“辞章之习”进入“始慕圣学”

这一年，阳明由“辞章之习”进入“始慕圣学”，应视为其为学历程的第一变。明初，几位稍有名气的儒学家，根据黄宗羲的看法，

①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9 页。

② 《年谱一》，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22 页。



“认为这个时期的主要思想家是吴与弼、薛瑄及陈白沙。不过，这些人对当时哲学思想并无新的贡献。除白沙以外，其他都是朱熹思想的解释者”^①。其中包括阳明在广信拜见的老师娄谅。娄谅是吴与弼的学生。从王阳明思想发展行程看，与娄谅的会面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年谱》以“是年先生始慕圣学”为条头，显然具有某种象征和标志意义。作为学生的少年王阳明，在学业上的选择并无更大余地，虽然早于少时已泛滥于辞章，但并非不知作圣之事。阳明在少年时，“作圣贤”之理想和“契于圣学”之用功是不同时期的事情。先有“作圣贤”之理想，后有“契于圣学”之用功。在用功方面，阳明首选的途径是辞章之学，但他后来知道，朱熹是把自己的儒学与所谓“记诵”“辞章”相区别的。“在朱熹看来，以往的儒学讲礼、讲孝，等等，但什么是礼、什么是孝，却并没有弄得清楚明白。在治国问题上‘礼意’和‘礼仪’之争，在尽孝问题上名教与自然之争，都是没弄明白的反映。”^②“汉代的儒学，在他们看来，只是记诵之学或者章句之学。这样的学问，就是没有弄清什么是礼、什么是孝。在认识上偏离了孔子的方向，在行动上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儒者之道”^③。娄谅向阳明介绍朱熹的格物之学，并告之以“圣人必可学而至”的道理，铸成了阳明由“泛滥于辞章”向“始慕圣学”的最初一变。按蔡仁厚的说法，这是“异质之变”。同时又是本体之变，这本体之变中无疑又包含着功夫之变。之后，阳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追求儒家之道并想找出宋儒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格物”一词的意义。《年谱》记述了十九岁时阳明刻苦用功于圣学以求“格物”之深蕴的感人事例^④：

（1490年）龙山公以外艰归姚，命从弟冕、阶、官及妹婿牧，相与先生讲习经义。先生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

① 张君励：《新儒家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②、③ 李申：《简明儒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④ 《年谱一》，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223页。

至夜分。四子见其文字日进，尝愧不及，后知之曰：“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谑，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惜放逸，今知过矣。”自后四子亦渐敛容。

▲ 第二变，因格竹不成，“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

但仅仅两年之后，一桩“格竹求理”的荒唐之举，使阳明的为学之途又发生了变化。《年谱》载曰^①：

五年壬子（公元1492年），先生二十一岁，在越。

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

阳明在父亲花园中对着竹子凝神静思，希望发现竹子中所含本性。这是朱熹所讲的方法，朱熹认为天地万物皆含至理，通过对一事一物的“格”，便可发现。可是阳明连“格”七天，还是一无所获，反而病倒了。阳明由此生出对格物之学的怀疑。如果说有什么收获，那就是所谓“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此段活动构成阳明为学历程上的第二变。这一次的变化并没有像王畿和梨洲所说的那样，立马开始“出入于佛老”，而是又回到了辞章之习的老路上。这一回头就是六年时间，不可谓短。

在二十一岁到二十七岁这期间，根据《年谱》的记载，阳明回到了以学习辞章艺能为主的旧途，这表明一个青年学子正徘徊不定。他也会希望从学子之业而一伸经国济民之志。他赴乡试落第，尚能以“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以自安。不过，他最终得进士

^① 同上。关于格竹一事发生的时间，不同《年谱》有不同记载。明崇禎施四明辑《阳明集要三编·年谱》中关于格竹一事载于“弘治二年己酉，先生十八岁”条。陈来于《有无之境》书中对《王阳明全集》书中《年谱》所载格竹之事于“弘治五年”条也提出了疑问。



及第并授命工部主事，也曾对边事饶有兴趣，以至于几番上书朝廷。

▲ 第三变，出入于佛老二氏

到了二十七岁这一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年谱》记载^①：

十一年戊午（孝宗弘治，公元1498年），先生二十七岁，寓京师。

是年先生谈养生。先生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静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浹洽，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

两次对朱子学说的怀疑，导致了阳明思想的两次变化。一次是二十一岁时“格竹之举”的失败；一次是二十七岁时读朱子《上宋光宗疏》产生的迷茫。不知是不是巧合，阳明的这两次怀疑，恰好反映了他对朱熹关于“格物致知”的二重解读的反思，这为他以后新思想的诞生埋下了伏笔。朱熹对“格物致知”有一套专门的解读，后为世儒所宗。其中关于“格物”的途径，朱熹主要讲了两条：一是通过读书以明义理；二是洒扫应对之接人待物。阳明正是老老实实照着这两条去做而产生迷惑的。照着“接物”一条而去格竹，照着“读书”一条而去“居敬”“循序”，结果均产生出“物理吾心终判而为二”的感受，更是“益委圣贤有分”。又恰逢有道士谈养生，便产生了“遗世入山”的想法。阳明二十七岁的这次变化，构成了其为学历程上的第三次变化。这是典型的“异质之变”。

在二十七到三十一岁这个期间，阳明的主要兴趣大概在佛教和道教。阳明一生与道、释二家的联系及受其影响，截至“龙场悟道”之前，《年谱》的记录至少有如下几个重点：

① 《年谱一》，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4页。

其一，成化十二年，阳明五岁，还不会开口说话。“一日与群儿嬉，有神僧过之曰：‘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竹轩公语，更今名，即能言。”^①

其二，弘治元年，阳明十七岁，七月在洪都娶诸氏做老婆，“合卺之日，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跌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②。

其三，弘治十一年，阳明二十七岁，“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

其四，弘治十四年，阳明三十岁。“游九华山，……是时道者蔡蓬头善谈仙……闻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历岩险访之。正熟睡，先生坐旁抚其足。有顷醒，惊曰：‘路险何得至此？’因论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后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后有会心人远之叹。”^③

其五，弘治十五年，阳明三十一岁。“是年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第二年，阳明因病来到杭州西湖休养，来往于南屏、虎跑等寺庙，“有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先生喝之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僧惊起，即开视对语。先生问其家。对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爱亲本性喻之，僧涕泣谢。明日问之，僧已去矣。”^④

佛教特别是禅宗，对宋明儒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虽然程朱学派非常反对禅宗，但宋以后的学者很少有不与禅者与佛书接触的。王阳明自不例外，且更有甚者。自明以来，阳明之后的空谈心性之风，无不与此相关。

阳明三十一岁之后，开始了他为学历程中的又一次徘徊。这次徘徊是从对佛、道二家的怀疑开始的。

十有五年壬戌（公元1502年），先生三十一岁，在京师。

①、②、③、④《年谱一》，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页、1222页、1225页、第1225~1226页。